

卓新平学术散论

# 「间性探幽」 —— 对话集

卓新平◎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卓 新 平 学 术 散 论 ④

# “间”性探幽

## —— 对话集

卓新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间”性探幽：对话集 / 卓新平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0

(卓新平学术散论④)

ISBN 978 - 7 - 5161 - 0129 - 2

I. ①间… II. ①卓… III. ①哲学-文集②宗教哲学-文集 IV. ①B - 53②B92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8511 号

特约编辑 陈 林 等

责任编辑 陈 彪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张建军

技术编辑 王炳图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字 数 266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

## 序

人是社会共在的产物，自然会有对话、有交流。可以说，对话在相遇与相识之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话沟通了与之相关的双方、二者。既然为“二者”、为“双方”，那么彼此的关系则为“间”性，即你我之“间”。“间性”是最基本、最原初、也是最重要的人际交往，而这种“间”性交往、沟通最主要的方式则是对话。这就意味着，对话即一种“间”性存在。

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人类社会进入了“对话”的时代，社会舆论中反映出许多宏观对话，对话的声势曾震撼世界，而“对话”也成了最为时髦的口号或表述。不过，对话不只是宏观的、时髦的，也是微观的、精细的。许多个我之间的对话、小范围的沟通成为人类之所以能够大力主张、积极推广对话的坚实基础。对话有着细微之处见精神的奥妙，是一种摸索、探究，因为对话也反映出“间”性的敏感、复杂，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表白。在此，则有着与对方的呼应、互动，“间”性反映出双方的试探和调适。每一个人从自我的角度而言都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小世界，其内在的精细、微妙乃深不可测，但其水深则静却让外人不易察觉。这个小世界往往是封闭的、私密的，不会轻易向外敞开；而即使在其敞开时，从外往内的窥视、了解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只有“曲径”才能“通幽”。如果说，解释学是一种“理解”的艺术，那么对话则反映了一种“通幽”的技巧。彼此能否有着成功的对话，在让对方敞开心扉时又能善解人意，则反映出人们“间”性探“幽”的本领。

今年新年贺岁片《非诚勿扰2》中让人们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

就是片中借用相传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但曾相见便相知，相见何如不见时？安得与君相诀绝，免教辛苦（一称‘生死’）作相思”的诗句而发挥了关于“相”的感触：“最好不相见……便可不相恋”，“最好不相知……便可不相思”，“最好不相伴……便可不相欠”，“最好不相惜……便可不相忆”，“最好不相爱……便可不相弃”，“最好不相对……便可不相会”，“最好不相谈……便可不相负”，“最好不相许……便可不相续”，“最好不相依……便可不相偎”，“最好不相遇……便可不相聚”。这一称为“最好不相见”的片尾曲是此片最后的精彩，扣人心弦。其实，这种“相”正是“间”性的动态表达，而所涉及的活动则带来了相应的结果或后果。不过，相见不一定就能相知，相遇或许仍难相识，由这种“间”性带来的不同结局使人们对“相”的作为有着复杂的感觉。若“相”能达到“间”性的良性互动、积极效果，那么这种“相”是能让人刻骨铭心、激动难忘的；但如果“相”使“间”性关系恶化或生出种种误解及误会，则会让人后悔莫及，发出“相见何如不见”的伤感和叹息。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有可能会再次封闭自我，独舔伤痕，由此感到独立孤寂反而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内在的宁静和幸福，从而作出淡泊人生、独往孤行的另类选择。为此，人们会感慨“距离让人陌生”，可是“距离也会产生美”。“距离美”让人对相遇、交往这种“间”性关系却步。如果相遇、相见不是通往相思、相爱而是造成相恨、相别，反而不如保持以往的“间”性距离，留有模糊、陌生的美感。爱情如此，世事亦然！“间”性关系的形成会给人温馨，但也可能让人身陷险境。所以，“间”性是一种未知，也是一种冒险，而“间”性之“相”则恰似探险之旅。可是，人类社会及其成员的群居性不可能让人们彼此之间孤独相处、不相往来。正如影片中李香山之女所朗诵的诗歌“见与不见”在印证的场景：“见”与“不见”，都“就在那里”！社会交往、思想交流的关系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因此，现实人生中很难有享受“空谷幽兰”的“隐士”，人与人之间更多是不得不相互面对。对于过于拥挤、近距离或零距离接近的人际关系，德国人在其语言中会用“害怕”、“恐惧”（Angst）来表达，这是“间”性不可避免的窘境。也是我们必

须正视的现实。人生相遇是一种“苦”，也是一份“缘”，同样也有其“乐”。相遇的最多方式即“间”性对话，尽管其“间”会错位、有误解，但还是会带来许多沟通、了解、理解、交友的乐趣。既然无法回避人际交往的“间”性，那就应该采取坦然、积极之态去面对。所以说，“间”性探幽，也是一种敞开心扉、坦诚相见的机缘，我们不必错过，而且或许还有意外之喜、格外之获。正是以这种态度，自己在过去近三十年来敢于与社会各界人士展开各种交谈和对话，而接触他者、享受“间”性，可谓让人大开眼界、获益匪浅。

必须承认，在自己的学术和工作交往中，也不时遇到一些理解上的障碍或误区，人与人之间坦诚相待、推心置腹的机会并不多。在“君子之交淡如水”、“距离产生美”的误读或遁词下，现实生活中有着“间”性上的不必要隔膜与疏远。其实，这主要是缺乏对话、交流的结果。就个人性情而言，我是非常坦率、耿直的，并乐于与人对话。如果有机会，我也会非常健谈，甚至会不时爆出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冷幽默”。当然，对话理解绝非易事，就是在彼此言谈之间也会发生歧义、产生误解，造成分殊。所谓言不达意，或者因为说、听反而生异，描述的正是这种尴尬处境。考虑到可能发生的这种场景，人们宁愿保持沉默，以免“言”多必“失”，“说”而不当，甚至“祸从口出”！虽有“善言为银”的公共交往的常识，不少人却更相信“沉默是金”的金规则。显而易见，就是在我们敞开心扉与人对话时，同样也可能产生过误表、误听和误解。“间”性沟通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在我所居住小区范围内，曾有一个题为“间”性小屋的商店，以出售工艺品、纪念品为主，小巧而雅致。因其店名“间”（Between）而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在路过此地时偶尔也会去光顾，顺带略买一两件礼品留存。我老是主观猜想，如此店名恰好说明这所小店立意于与顾客之间的沟通，旨在和气生财。然而也不知什么原因，不久前小店终于关门、转让。此后每当我回家途中不再看到“间”的店牌，心底不免有所惆怅和失落。或许，当人们沟通不畅，“间”性交往受挫而难达“通幽”之境时，也就会重新回归心灵自我，导致关门自闭。在当代转型社会的复杂人际关系中，

这种现象已频频出现，也总会让人默然无言。

打破现代社会中的封闭和自闭，是我们研究精神世界者所特别关注的。其表现方式之一，就是自我积极参加对话，全力投入对话，让对话真诚，并有深度和广度。为此，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也有了与各种人士、各种话题的对谈，有些映入脑海，有些则留在笔端。这样，也就有了本书中的约二十篇对话记载。当然，对话是两人以上的合作，表达了多人的努力。在上述对话中，我多是被动者，是被找来而应答。因此，许多对话记录最早也是出自他人之手，即为我的对话伙伴的辛勤劳动成果。不过，一旦答应对话，我会毫无保留，积极沟通，因而虽为被动，却很配合。在各种不同的对话中，自然既有“共识”、“知音”的喜悦，也会意识到分歧、区别的存在，既有淋漓尽致的畅谈，也不乏小心翼翼的慎言。在上述对话经过录音整理，形成文字之后，我一般会在自我审读时有所掂量，相应修饰。既然对话已经是一种公共行为，有其开放性、公开性，所以我也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参与对话，或是认真倾听，或是积极建言，让“间”性更为活跃，使“相”互更少遗憾。为了弥补自己曾有的被动，我想将这些对话汇聚成集，出版留存，从而成为主动的编著者。这些对话涉及许多内容，大致勾勒出我三十年来对人生、对社会、对学问、对研究工作以及对更广意义上的文化艺术之所思、所想和所谈。书中的这些表述虽有其随意性，但建基于友好的对话、真诚的交流，因而是自己真实思想、内在心境的自然表露或表白。当然，对话者的志趣、兴致比较明确，自己的关注也相对定向。出于种种考虑，在重新组织这些对话稿件时自己在其方式上、内容上、结构上和文字上也有一些调整或修改。在此，一方面要特别感谢各位对话伙伴对我的支持和关爱，另一方面也请大家原谅我在公开这些对话时的微调 and 修饰。

历史上有许多思想大家在回顾自己的一生经历时曾多以“忏悔录”或“沉思录”命题，相比之下，我自惭还没有达到那种自省自悔的思想境界，尚无澄明、透彻的觉悟，但从内心也非常向往他们剖析自我时的真诚和深沉。以此为参考和借鉴，则可摸索人间话语的真谛和真道。虽然这里记载的并非自己内在反省的独白，却有着坦率而诚意的双向沟通。而敞开

“间”性，就是衷心希望人们在人际交流、思想沟通时能有真情表白，并换来真诚回应，以使这个复杂的世界能够稍微真实、透明一点。

卓新平

2011年3月6日于北京车公庄



# 目 录

序 .....	1
一 关于今日中国宗教的谈话 ——1988年回国前与《分享的外衣》特邀记者比勒 菲尔德对谈 .....	1
二 德国大学的文科教育及其研究生培养 ——1989年与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师的对话 .....	9
三 学海梦寻 ——1992年与《神州学人》特邀记者对话 .....	35
四 建造学术金字塔 ——与《世界宗教文化》编辑于光座谈 .....	43
五 中国宗教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宗教学研究四人谈 .....	48
六 全球化时代的基督教与中国宗教之间的关系 ——2004年10月26日在清华大学与莫尔特曼的对话 .....	72
七 在神圣与世俗之间求索 ——《中国宗教》特约记者黄奎与卓新平访谈录 .....	81
八 艺术是对最高境界的不断追求 ——关于莫道宏艺术探索的对话 .....	89
九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的宗教问题 ——2008年与库恩的对话 .....	93

十 以真求学 以善待人 以美为鹄	
——唐晓峰与卓新平访谈录 .....	99
十一 跨文化传播：信仰之间的重要相遇	
——《对外传播》对卓新平的专访录 .....	114
十二 从超越境界到欣赏包容	
——卓新平、梁燕城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深度对话 .....	129
十三 与龙泉寺法师的对话 .....	154
十四 从金融危机谈宗教	
——2009年年初与《绿叶》杂志记者对谈 .....	159
十五 纪念任继愈先生——对卓新平的访谈	
——《长江商报》记者与卓新平的对话 .....	174
十六 关于世界文化现状与趋势的座谈	
——2010年1月文化研讨会上相关问题问答录 .....	177
十七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世界宗教所立所之本	
——2010年与《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座谈 .....	191
十八 关于“人类‘宗教共同体’”的对话	
——2010年年初与安伦的座谈 .....	196
十九 加强文化战略 提高文化软实力	
——2011年2月与社科网记者对话 .....	232
二十 湖湘文化：不仅是湖南的，更是世界的	
——2011年3月《湖湘文化》记者访卓新平 .....	238
附一 卓新平学术简历 .....	242
附二 卓新平主要著述目录 .....	244

# 一 关于今日中国宗教的谈话

——1988年回国前与《分享的外衣》

特邀记者比勒菲尔德对谈

**记者题记：**自从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放国际学术与文化交流以来，约有64000名年轻的中国学者被送往76个不同的国家留学进修。这些学生绝大多数选择到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美国去深造，而去苏联及东欧其他国家的中国学生却微乎其微，至1985年只有138名学生在其大学注册学习。

中国送往国外学习的留学候选人绝对是学界精英，他们来自著名的研究所、科学院和行政机构。但人们也察觉到他们中有大部分人出国学习后并不想重新回到家乡，其原因虽然可以理解，但这些海外进修学者不愿回归对于中国教育领域的投资和学术力量的增长却是巨大的损失。与之相反，迄今在被送往海外学习中国学者中仍然约有30%的人表示准备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去。毫无疑问，只要提供相应的机会，这些人的回归肯定能为中国现代化的计划作出贡献。

在这些准备回国的人中间就有卓新平博士，他于1983至1988年作为我们的奖学金生在慕尼黑大学研习哲学、宗教学和国际汉学，并以《中西当代宗教理论比较研究》的论文在欧根·毕塞尔教授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卓新平博士计划于1988年11月回到北京其原来就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之前，我们有机会与卓博士进行了下述对谈。

**记者：**卓博士，您于1983年6月来到联邦德国留学，你们这批学者怎

样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出国留学的奖学金呢？

**卓新平：**这有着各种渠道，通常会以国家学术交流项目的方式来取得。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联邦德国的各种政治及科学基金会有着合作，也与各大学和研究所开展了系列的学术交流计划。因此，一位合格的学者或是通过中国相关研究机构的提议、或是基于与国外的学术联系而获得邀请，都可以到欧洲或美洲去留学。

在资助留学上大致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通过国家，即通过我们的教育部、通过各科学院或各个大学来解决；另一种则是以自费的方式，其中也包括通过在国外亲戚朋友的资助来解决。当然也有不少人员是通过获得国外各种奖学金而得以出国留学的。

**记者：**在联邦德国留学五年多之后，您现在准备回国了。那么您是否已经知道在中国您会做什么呢？具体来说，您将会做什么工作或有何种任务呢？

**卓新平：**回国后我将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我们研究所在中国是研究全世界各种宗教最好的研究机构之一。我本人将会在研究所的基督教研究室工作。自己的研究将包括对欧洲中世纪哲学史的探讨，寻根溯源，以便能更好地理解西方当代的发展。我还想将欧洲的经验与中国相比较，由此可有利于我们今天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记者：**你们在北京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在中国整个学术领域和公共社会中有何种地位和价值？

**卓新平：**我们研究所对于中国的宗教研究来说有着重要意义。全世界大多数人都有着宗教信仰和相应宗教社团的归属，了解这一点并对宗教加以研究，对于认识整个人类及人类历史发展绝对必要。宗教与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密切关联，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宗教，就不可能正确地研究并理解人类历史、文化、经济或人之本性及本质。宗教其实与哲学、政治、文学或者说与绝大多数精神科学以及自然科学都有着交织和相应关系。当然，这一任务非常艰巨，当代中国社会对宗教的认识仍然差距很大，分歧明显，争论尖锐。我回国后也很难回避对宗教的理解和界定问题，而我对宗教的解释和论述也可能会被误解和受到批评。对此，应有一些思想准备和足够的勇气。

记者：您在《中西当代宗教理论比较研究》的博士论文中，触及一些自身并非宗教信仰者的理论家的思想和立场。宗教在中国是否仍然被视为只是过去社会的一种残余？是否也可把宗教看作是一种从理论、精神和文化史意义上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現象？

卓新平：目前中国在论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如果人们真想正确理解终极存在或探究终极意义，就必须观察、思考并研究宗教现象。不少中国学者过去对宗教的理解比较狭窄，其表述的宗教意义也是内涵大、外延小，从而不把中国视为具有宗教信仰的国度。中国古代传统中的儒家世界观被解读为一种人生哲学、似乎与宗教毫无关系。基于这种理解，对宗教的评价多为否定性或贬低性的。由于中国过去五十年曾被西方社会所封锁，在对外思想文化交流上处于一种隔绝的状况，没有与外界宗教学者或哲学家们关于宗教的论述展开广泛对话和深层次沟通，由此中外的宗教认知及理解差异很大，缺少一种接轨和共识。因此，在德国被普遍认可的宗教观在中国则可能仅是极少数人的看法。二者能否真正做到“和而不同”，难度很大。但促进双方的对话，达到深层次的沟通，像我们这样从西方社会留学归国的中国学者，理应起到在彼此之间筑桥铺路的作用。

在今日中国，当人们从学术意义上谈论宗教时，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就是究竟应从内在还是从外面来观察、理解宗教。中国有句老话：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会有不同的印象或收获，但也会有各自的弱点或局限。如果从内部观察就难以把握其全貌，但仅从外部观察则深度不够，难窥其堂奥、悟其真谛。我在博士论文中有意识地尝试在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背景的理论家与西方神学家、宗教学家之间展开思想对话，以便双方能更好、更准确地了解并理解彼此。在过去，中国社会及学术界对于宗教的误解实在太多，而西方对中国的偏见同样也不少，其原因就是只从自己的一方来观察思考，缺乏一种换位思维和双向互动。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人们要想相互理解、获得对彼此的正确认识，就必须注意观察、倾听并认真研究各种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加以比较对照，开展对话沟通。通过深入讨论和真诚对话，就能克服过去的误解和偏见，甚至可能找到双方都可认同的连接点。然而这种理论对话目前刚刚

开始，对话的未来前景不明，会面临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可能要走漫长、艰辛的探索之路。对此，既要有勇气，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记者：在一个无神论——社会主义的社会中，有着反宗教或不理解宗教的氛围，那么宗教会怎样生存、其意义何在？

卓新平：按照传统的理解，信仰宗教的人在中国只占少数。这种理解主要是基于对宗教社会组织和分析评价，其基本把握即社会存在中的宗教社团，由此来展开对宗教与社会，生存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与经济形态的探讨。被普遍接受的基本思路深受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的影响。其不足之处是对人的精神灵性、尤其是宗教性关注不够，或者说缺乏考虑。而在现实生活中，不与宗教社团组织直接挂钩，还普遍存在着宗教观念、宗教情感、宗教心理即人们的“宗教性”问题，加之中国固有的民间、民俗和大众信仰，这种精神氛围和灵性追求并不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有着本质区别，因此，我不同意中国“无宗教”、中华民族是“无宗教”的民族之说，不同意以“无宗教”来简单或草率地作为中国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根本区别。其实，在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主张中国“无宗教”最坚决、最极端的几个领军人物，后来都不同程度地肯定了宗教在中国的存在，承认较为普遍的人之灵性或信仰精神，并主张或极为赞成中国人对佛教的信仰。

从纯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宗教诚然重要，却仍远远不够以此来真正揭示宗教的奥秘、正确解释复杂的宗教现象。如果我们回溯历史则不难看出，中华民族如同人类其他民族一样，宗教的存在与发展对于中华文明的古今大观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华文明有着深厚的宗教底蕴。若将宗教因素从中华文明体系中剥离出去，那么这一文明则失去了其实质性内容而仅剩一个空壳。正如西方的发展与基督教有着紧密的关联那样，中国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儒教、道教、佛教的积极参与；甚至要想深刻剖析中国的思想、哲学体系，也必须对宗教在其中的作用及影响有深入、透彻的了解和把握。今天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其与世界的整体关联自然也包括文化多层面的接触和交融，其中就有对宗教之重要性的重新认识和强调。

不过，许多中国人对自“鸦片战争”以来基督教在华传教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性的，这种否定和反感来自这种传教活动曾与帝国主义、殖民主

义侵华有染，其当年的成功也是因为西方各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对传教的保护、支持和纵容。卷入这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殖民主义侵犯“人权”之中的传教士自然没有给中国人留下好的印象。对此，西方基督教反思和反省都很不够，而当年卷入这场“东方入侵”的西方大国迄今也仍然没有严肃、认真地向中国认错、赔罪。脱离这一历史背景而只是一味抽象地谈论所谓中国“宗教自由”、“人权”等问题，中国人当然会反感、会本能地对之坚决抵触，并认为是以往历史上西方强权、霸道的继续、再现。我认为西方教会人士应在解开这个“心结”上有对中国更加诚恳、尊重的态度，而不能再延续历史上的那种居高临下之位、颐指气使之态。“谦卑”、“悔罪”、“和解”、“博爱”才是西方教会基于其信仰本真而对待中国的正确态度。当基督教文明与中华文明这两大文明相遇甚至相撞而互不相让、都不愿意低低自己“高昂的头”时，我们这些研究宗教尤其是研究西方基督教的学者显然会有要遭受理解“磨难”之感，会有在彼此的冲撞、摩擦中穿越“炼狱”的经历，会感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所以也只能小心翼翼、步履维艰地开展相关研究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的宗教研究显然就是一门“险学”了。

但从积极态势来看，中国社会也开始比较整体、全面地评价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历史、承认其中外文化交流、思想沟通的历史功绩，也看到了基督教在这一巨变的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出现的自我批评和变化发展，包括对一些来华传教士在促进社会福利、改善文化教育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也有了充分的肯定。这种态势也使我们对未来发展感到乐观、充满期望。

记者：自从圣方济各·沙勿略于1553年在中国南部沿海的上川岛逝世以来，中国就被视为基督教在远东传教充满魅力、具有巨大吸引之地。耶稣会随之建立起欧洲与中国之间最早富有意义的联系。这种交往对于欧洲而言比对中国有着更大的意义，西方人迄今仍保留着这一印象，因而今天还想继续这一来往。您看这种印象是不是一种幻觉、是否会让人失望？

卓新平：这的确有道理。尽管第一批基督教传教士给中国带来了欧洲的科学和基督教信仰，但另外他们也向欧洲输入了中国精神及东方智慧。通过欧洲学者与来华传教士的书信来往，通过探险东来的传教士和旅行家关于在中国宣教或游历的报道，中国的哲学和精神历史也对欧洲社会产生

了巨大影响。例如，伏尔泰曾认为不要往中国派传教士，而应该邀请中国传教士来欧洲，以便向欧洲人传述儒家伦理和道德哲学。而莱布尼茨在其构设二进位时也与来华传教士讨论过中国的阴阳观念、《易经》的演算及其奥妙等，这种交流所碰撞出的思想火花对其科学发明及突破也带来了不少刺激和启迪。同理，基督教在华传教也给中国带来了许多新的科学知识，尤其是促进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通过传教士的引进，我们在天文、数学、机械制造等技术方面获得了新知识、学到了新方法、有了新眼界。此外，我们也由此接触到西方的许多哲学理论、政治思想、社会观念，从而感到耳目一新、海阔天空。这些社会政治理念曾在中国近代变革中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我们必须从文化高度来看待这种交流和融合，并对之加以积极和肯定的评价。

记者：从最早的耶稣会来华宣教算起，基督教徒在中国还从来没有达到过其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对于西方而言，中国仍然是对其宣教富有挑战性的召唤，因为在其看来，中国人的皈依总是有着可能性的，是一个已经开放、可以开拓的领域。您怎样来前瞻基督教在中国的未来？

卓新平：这是一个关涉到基督教在华本色化的问题。基督教在华宣教过去曾经历过所谓“礼仪之争”，由此导致当时整个传教活动的失败。在我看来，除了政治原因之外，宗教的本色化是其传播最为关键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相关宗教会反映或代表某种文化。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基督教所代表的文化是否可能被中国人百分之百地接受？或者说，有无必要找到一种妥协，发现相关合题，从而使这一宗教在新的文化处境中仍然能够继续生存和发展？根据我们的研究和总结出的历史经验，基督教在华传教还没有从根本上恰当地解决其本色化即“中国化”的问题。

在 20 世纪的现实处境中，我们在重新讨论宗教本色化的根本性问题。只有某一种宗教很好地适应某种文化，也就是说，将其原有文化因素与新的文化因素有机结合、达到理想的和谐共构时，它才有可能在另一种文化处境或社会环境中生存下来，继续发展。除此之外则别无他途。

从另一方面来讲，一种宗教若完全放弃其原有传统和文化因素，也不可能继续生存。一旦在文化意识上完全失去自我，在社会存在上也就不再有自我的立足之地。这种情况最为典型之例就是犹太教在中国过去历史上



的存在与消失。当年河南开封的犹太教在完全接受中国文化、逐渐放弃其民族特性之后，就难觅其历史踪迹，成为现在世界上的犹太人都百思不解之谜。犹太教在中国儒家传统亲和力浸染下的销声匿迹，也使基督教害怕在华重蹈覆辙，故而一方面推广其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又想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守住自我特色的免疫力。这样，输出与吸收、占领与适应、“中华归主”与“主归中华”就形成了张力，这种紧张到现在还没有松弦。对于宗教与文化研究者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它表明本色化之维对于宗教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的生存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可能带来的担心和疑问。我个人觉得，如果基督教能够更为成功地解决其在华文化本色化和在中国社会处境化的问题，自然也就会有其更新更大地发展机遇和令人乐观的前景。

记者：可以明显察觉到的对西方开放，社会转型的变化态势，以及在您的论文中所提及的在今日中国关于宗教各种不同的评价，所有这些现象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

卓新平：我们在“文革”中有着非常痛苦的经历，在反思过去中人们开始自问：为什么在整个世界中都代表着最高发展的中国文明中会出现这样的不幸，必须面对如此痛苦的经验教训？这种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对我们的触动很大。回顾历史，中国一旦闭国锁国、自我封闭，就会保守、落后，而在对外碰撞中也就会处于被动之状、就会受气挨打，而且会输得很惨。为此，我们在当代重新觉醒、要“振兴中华”；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我们也必须学习其他国家、民族和文化的经验，以充实、提高、改善我们自身。虽然现当代的开放发展也会有冲突、有较量和竞争，但这种相互学习、彼此交流、和平共处、和而不同则是更重要、更必需的。在这一进程中，我们留学西方的中国学者回到自己的祖国，扮演文化交流、和平对话的使者，自然也是一种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

从悠久丰富的中国文化来看，我们有着好的传统，也有着很好的制度；但为了进一步发展，为了达到更好的改善，就必须注意观察、比较、研究、甚至学习其他传统和制度。为了避免再犯以往的错误，我们目前正在非常具体地观察、探究欧洲或整个西方的发展，注意到其技术、自然科学、精神和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对于我们自己的现代化而言，我们想学